

# 文化距离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跨国流动的影响

周芬芬, 罗光强

(湖南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28)

**摘要:** 基于2008—2019年中国跨国流动至19个国家的农村劳动力数据,运用扩展后的引力模型,实证分析文化距离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跨国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文化距离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跨国流动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与流入国的文化距离每减少1个单位,流入该国的中国农村劳动力人员数就增加68.8个百分点;文化距离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跨国流动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流入发达国家的阻碍效应明显强于发展中国家。当前应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行动方案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加快文化国际传播进程,提高文化融合度与包容度,制定针对性文化交流策略,加强流入国文化培训。

**关键词:** 文化距离;农村劳动力;跨国流动

中图分类号: F304.6; C912.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21)06-0056-06

## Impact of cultural distance on Chinese rural labor's transnational mobility

ZHOU Fenfen, LUO Guangqiang

(College of Economics,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ese rural labor's mobility to 19 countries from 2008 to 2019,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cultural distance affects Chinese rural labor's mobility by using Extended Gravity Model. Results show that cultural distance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the Chinese rural labor's transnational mobility, and the number of the Chinese rural labor entering the target country increases by 68.8% with the reduction in the cultural distance per unit from the target country. Regional heterogeneity exists in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distance on the Chinese rural labor's transnational mobility, and the barrier effect is stronger in developed countries tha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urrently, it is of necessity to further promote the action pla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ccelerate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strengthen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inclusion, formulate targeted cultural exchange strategies and enhance the cultural training of the target country.

**Keywords:** cultural distance; rural labor; transnational mobility

### 一、问题的提出

全球化浪潮促进世界各国经济交流更加频繁,联系更加紧密,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成为必然,劳动力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也在各国之间相互流动。当前,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不断增强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这是党在新时代对外开放宏伟目标的重要宣示。在百年未有之变局的背景下,中国实现和平崛起与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需要通过合理有序有效输出劳动力、加强与各国经济文化交流以实现“走出去”战略和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成功的跨国流动不仅是劳动力进入东道国,更重要的是能够适应当地的语言环境和社会习俗,因此,文化因素无疑是影响劳动力跨国流动的重要因素。《2020年国际移民报告》显示:60%的亚洲移民都在亚洲特定文化区域内流动,显示了文化特质在劳动力流动中的影响力。研究文化距离

收稿日期: 2021-11-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7BYY154);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AJY012)

作者简介: 周芬芬(1980—),女,湖南永州人,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经济学、语用学。

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跨国流动的影响,对于中国更好开展国际合作、创造良好国际环境和开拓广阔发展空间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文化距离对劳动力跨国流动的影响,学界主要进行了以下研究。Yasar Kondakei 发现吸引留学生前往土耳其留学的主要动因是母国与土耳其历史文化的相似性,而文化相似程度高低决定了留学生的规模<sup>[1]</sup>。Mazzarol 等认为留学生母国文化与其他国文化的差异以及留学生对国外文化的熟悉程度会影响其出国留学时的区域选择<sup>[2]</sup>。魏浩等实证分析表明,一国输出的文化产品越多,一定程度上会缩小该国与各国间的文化距离<sup>[3]</sup>。郭新茹等基于31个与中国文化产品贸易频繁的国家进行实证检验认为,文化距离是影响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主要因素<sup>[4]</sup>。许和连等深入到省份对国别的层面分析了文化差异对各国(地区)在中国各省贸易格局的影响<sup>[5]</sup>。李月娥等选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22个国家2000—2017年农产品贸易数据,分析了文化距离对农产品贸易影响的地区差异<sup>[6]</sup>。彭继增等从Hofstede文化维度理论出发,运用随机前沿贸易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文化距离对中国进出口贸易效率的影响<sup>[7]</sup>。卢朋认为国家文化差距较大且对外国文化缺乏了解,易导致跨国劳务人员与当地人员产生不必要的摩擦与纠纷,长期不利于两个劳动力市场的融合,进而阻碍劳动力跨国流动的未来发展<sup>[8]</sup>。王殿华通过分析中国东北地区的对外劳务输出,发现文化相近或相似能够使跨国流动信息交流的渠道更加广泛和畅通,极大地减少因文化障碍带来的交流成本<sup>[9]</sup>。钱雪亚等发现受教育年限越长即语言文化程度越高的人,就业的流动能力越强<sup>[10]</sup>。陈昭玖等实证分析得出受教育年限对农民工就业流动具有显著影响的结论<sup>[11]</sup>。

文献梳理表明,既有研究对文化距离影响劳动力跨国流动的探讨主要是分析出国留学、出国就业两类劳动力人员,且主要探讨对贸易的影响,相对缺乏文化差异对农村劳动力这一特定人群跨国流动影响的研究。笔者将在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扩展引力模型,选取2008—2019年中国农村劳动力跨国流动至19个国家的数据,实证检验文化距离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跨国流动的影响,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国家之间文化的差异主要用文化距离来度量。目前,学界主要采用以下3种方式来对文化距离进行测度。Hofstede Geert 通过研究IBM员工的价值体系构建四个文化维度来测度文化距离,即权力距离、个人与集体主义、男性与女性气质、不确定性规避,随后又增加长期与短期导向、放纵与约束两个维度,为之后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sup>[12]</sup>。Schwartz S H 提出人类基本价值观理论,主张用自我导向、刺激、享乐、成就、权势、仁慈等10种普遍基本价值观指标来衡量国家间的文化距离<sup>[13]</sup>。Inglehart R 等则通过绘制世界文化地图,利用传统与世俗理性价值、生存与自我表现价值两个指标来表现文化距离<sup>[14]</sup>。田晖将以上三种文化距离测度方式的适用范围进行对比,指出Hofstede文化维度是基于工作领域文化距离的研究,对非工作领域场合的适用性有待深入研究,Schwartz的研究样本是教师和学生因而不适应于商业领域研究,Inglehart等的方法是从各国政治民主差异比较进而切入到国家文化差异,反映的是国家间的政治文化距离<sup>[15]</sup>。由于本研究的对象是跨国流动农村劳动力,故综合分析后决定选取Hofstede的六个文化维度来测度文化距离,以衡量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

### 1. 文化距离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跨国流动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跨国流动考虑的重要因素是跨国流动的成本,文化距离能够通过作用于流动成本进而影响农村劳动力跨国流动。如果母国与流入国之间存在较大的语言文化差异,即文化距离较大,思维方式、价值观、宗教信仰、生活习惯、行为礼仪等方面差异明显,则农村劳动力跨国流动的成本将会增加,因而阻碍其在国家间的流动。Kokka 等研究认为,具有相似语言文化的国家拥有典型的聚集效应<sup>[16]</sup>,有相似的语言文化更容易让跨国流动的劳动力获得“人缘”,从而更好地融入流入国的人文环境。两国的语言文化差异越大,跨国流动时劳动力之间的“心理成本”也就越大<sup>[17]</sup>,进而影响劳动力在两国间的流动。具体而言,跨国劳动力扩大社会资本、进行交流和沟通、积累更多知识经验都离不开对流入国语言文化的熟悉。如果两国文化距离大,不熟悉流入国语言文化的农村劳动力在当地因无法接受较大的语言文化差异将会产生极大的心理落差,在交流沟通过程中容易造成不必要的矛盾

与冲突,从而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也就增加了跨国流动的心理成本,限制了两国间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H<sub>1</sub>: 文化距离对劳动力跨国流动具有负向影响

2. 文化距离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跨国流动影响的区域异质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日趋频繁。国家间的文化差异也随之变化并呈现出差异程度不同的特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会通过出口文化产品等各种途径不断向其他国家传播和弘扬该国的文化,进而在他国文化中产生一定影响,有效缩小两国间的文化差异,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在缩小文化差异方面的能力则有限。因而,中国与各国文化距离存在差异,这将会对农村劳动力跨国流动产生异质性影响。此外,现阶段跨国流动中国农村劳动力主要是普通劳务,集中分布在农林牧渔业、制造业和建筑业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科学技术水平也相对较高,对劳动力的综合素质要求也就越高,呈现出中高级劳务需求增多、普通劳务需求下降及其准入条件日趋严格的总体特征。因此,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与他国文化差异的程度有所区别,即两国文化距离大小存在差异,这将会对农村劳动力跨国流动产生异质性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H<sub>2</sub>: 文化距离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入发达国家的阻碍效应相对发展中国家更大。

### 三、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 1.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本研究旨在分析文化距离对农村劳动力跨国流动的影响,因此选取的被解释变量是:2008—2019年中国农村劳动力在19个所选样本国家的人数(L;人),以动态地反映近年来中国农村劳动力跨国流动的变化情况。基础数据来自商务部以及《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发展报告》《中国对外劳务合作发展报告》。考虑到流动至各洲的中国农村劳动力总人数排名以及流入国相关变量数据的可得性,选取2019年中国农村劳动力年末在外人数居于各洲前列的共19个国家作为样本国家。中国农村劳动力跨国流动从事的行业有:农林牧渔业、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住宿

和餐饮业、科教文卫体业以及其他行业。根据《中国对外劳务合作发展报告2018》与《中国对外劳务合作发展报告2019》中对农村劳动力从事行业情况的统计,农村劳动力主要分布在农林牧渔业、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住宿和餐饮业、科教文卫体业。因此,本研究通过剔除从事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以及其他行业的劳动力人数,计算得到研究期间中国农村劳动力在19个所选样本国家的人数。所选取的样本国家是日本、新加坡、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5个亚洲国家,阿尔及利亚、安哥拉2个非洲国家,俄罗斯、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5个欧洲国家,秘鲁、阿根廷、委内瑞拉3个拉丁美洲国家,美国、加拿大2个北美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2个大洋洲国家。

(2) 核心解释变量。本研究所选取的核心解释变量是中国与各样本国家的语言文化差异,用文化距离(CD)表示。基于前面的分析,使用Hofstede的六个文化维度,利用Kought & Singh推算得出的下式计算得出各国家间的文化距离:

$$CD_{ej} = \sum_{k=1}^6 [(I_{kc} - I_{kj})^2 / V_k] / 6 \quad (1)$$

上式中 $I_{kc}$ 为中国在第 $k$ 个文化距离维度上的得分, $I_{kj}$ 为国家 $j$ 在第 $k$ 个文化距离维度上的得分, $V_k$ 则表示在 $k$ 维度上各国得分的方差。不可否认,Kought & Singh的公式能够将文化距离以直观、准确的方式测度出来,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个国家间交流更加频繁,而国家间的文化距离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往来的加深而逐渐缩小。因此,本研究将綦建红等<sup>[18]</sup>的研究与Kought & Singh公式相结合,引入中国与流入国的建交年数,得到以下文化距离测量方法:

$$CD_{ej} = \sum_{k=1}^6 [(I_{kc} - I_{kj})^2 / V_k] / 6 + 1/Y_{ej} \quad (2)$$

上式中, $Y_{ej}$ 代表中国与样本国家 $j$ 之间的建交年数。中国与各样本国家建交的基准年份数据来源于中国外交部官网。

(3) 控制变量。根据已有研究文献,除了文化因素,农村劳动力跨国流动的影响因素还来自于经济、政治等方面,故引入以下4个控制变量,包括流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亿美元)、人民币汇率(EXRATE)、中国对各国贸易进出口总额(TRADE;百亿美元)以及流入国是否同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合作文件(DUM)。劳动力流入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母国货币汇率变化会影响跨国劳动力的工资

收入变化,使用人民币对美元的历年汇率来反映人民币汇率的变化,相关数据来自中国银行官网;中国对各样本国的贸易进出口总额可以反映两国间经济交流密切相关程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农村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基础数据源自联合国贸易数据库;签订“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能够增强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经济贸易、政治等方面的合作与联系,由此产生农村劳动力跨国流动辐射效应。将样本国家是否同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设定为虚拟变量,令签订“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为“1”,未签订“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则为“0”。若与某样本国家在第 $t$ 年签订协议,则自 $t$ 年开始(包括第 $t$ 年),以后年份的该虚拟变量值均取“1”。相关数据来自中国一带一路官方网站。所有控制变量数据时间范围均为2008—2019年。

针对上述各变量,表1给出了所选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1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Ln(L)$	12.749	1.463	8.018	2.432
$CD$	4.534	0.628	2.544	1.123
$Ln(GDP)$	12.275	6.555	9.072	1.360
$EXRATE$	0.163	0.144	0.153	0.006
$TRADE$	63.571	0.440	8.407	11.515
$DUM$	1.000	0.000	0.149	0.356

结果显示,中国农村劳动力跨国流动人数差异较大,最大值为12.75,最小值为1.46,标准差达到2.43,数据离散程度较高。中国与各样本国的文化距离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标准差分别为4.534、0.628、2.544、1.123,与所选样本国的文化距离值比较分散。流入国国内生产总值最大值为12.275,最小值为6.555,标准差达到1.360,显示所选样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人民币汇率从0.144到0.163,标准差为0.006,说明中国货币价值变化较为稳定。中国对各样本国的贸易进出口总额最大为63.571、最小为0.440,标准差达到了11.515,所选样本贸易进出口总额离散程度高,差异明显。

## 2. 模型构建

引力模型已经被学界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到双边贸易的实证分析中。Tinbergen J于1962年最先提出引力模型并用于分析双边贸易规模<sup>[19]</sup>,研究表明两国贸易规模与两国经济总量成正比、与两国之间距离成反比。Linneman H在此基础上对引力模型

进行扩展,认为两国贸易规模还与人口规模有关,且二者呈现正相关关系<sup>[20]</sup>,Berstrand J则进一步用人均收入替代了人口规模指标<sup>[21]</sup>。在后来引力模型的扩展与应用中,语言文化、殖民历史、优惠贸易协定、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政府治理质量、合约实施保障等变量被添加进去。本研究将农村劳动力跨国流动规模与双边贸易规模做类比,运用扩展后的引力模型探究文化距离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跨国流动的影响。

$$\ln(L) = \beta_0 + \beta_1 CD + \beta_2 \ln(GDP) + \beta_3 EXRATE + \beta_4 TRADE + \beta_5 DUM + \varepsilon$$

其中 $GDP$ 、 $EXRATE$ 、 $TRADE$ 、 $DUM$ 分别表示控制变量国内生产总值、汇率、贸易进出口总额、是否签订“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beta_0$ 是常数项, $\beta_1$ 是文化距离的回归系数, $\beta_2$ 、 $\beta_3$ 、 $\beta_4$ 和 $\beta_5$ 分别对应各个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varepsilon$ 则是随机干扰项。

##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由于控制变量汇率是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表示的,且同一年不同流入国的这个变量数值一样,不符合使用固定效应的条件,而随机效应前提条件更加苛刻且不如固定效应稳健,因此,本研究在混合OLS、固定效应以及随机效应3种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方法中,选择混合OLS回归方法,控制组内相关性,探究文化距离对农村劳动力跨国流动的影响。

### 1. 混合OLS的回归估计结果

本研究采用Stata16.0计量分析工具,使用混合OLS回归方法对上述模型进行估计。

回归结果显示,文化距离的回归系数为-0.688, $P$ 值为0.016,小于0.5。这表明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的文化距离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跨国流动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证实了 $H_1$ 。因此,与中国文化距离越大的国家,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入该国的人员数就越少;反之,与中国文化距离越小的国家,流入该国的中国农村劳动力人数就越多。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中国与流入国的文化距离每减少1个单位,输入该国的中国农村劳动力人员数可能会增加68.8个百分点。对于控制变量,流入国国内生产总值、人民币汇率、中国对流入国贸易进出口总额、流入国是否同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跨国流动分别具有显著负向、负向、显著正向、显著正向影响。可能基于以下原因:流入国GDP增加到一定程度后会提

升外籍劳动力准入门槛,即普通劳务需求减少且限制条件增多,而中国农村劳动力目前主要是普通劳务,因此流入国GDP会阻碍中国农村劳动力跨国流动;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上升,人民币升值,农村劳动力在外工资收入减少,不利于其跨国流动;中国对流入国贸易进出口额越大,流入国同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能够产生劳动力跨国就业辐射效应,促进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跨国流动。

表2 回归估计结果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CD	-0.688	0.259	-2.66	0.016
Ln(GDP)	-1.317	0.367	-3.59	0.002
EXRATE	-33.407	27.403	-1.22	0.239
TRADE	0.147	0.044	3.33	0.004
DUM	0.935	0.398	2.35	0.031
C	25.445	4.926	5.17	0.000
Observations	228			
R-squared	0.357			

## 2.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证明上面文化距离模型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与有效性,本研究采取调整样本期的方法对上述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将所有变量数据时间范围从2008—2019年扩展至2003—2019年。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CD	-0.630	0.239	-2.63	0.017
Ln(GDP)	-0.919	0.321	-2.86	0.010
EXRATE	1.922	16.766	0.11	0.910
TRADE	0.132	0.050	2.66	0.016
DUM	1.331	0.384	3.47	0.003
C	16.320	2.598	6.28	0.000
Observations	323			
R-squared	0.319			

根据表3稳健性检验结果,国家间的文化距离回归系数为-0.630,  $P$ 值为0.017,即文化距离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跨国流动的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二者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因此,通过扩展样本时间窗口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得到的检验结果与前面的回归结果大致相同,文化距离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跨国流动仍然有着显著负向影响。这表明文化距离模型回归结果是比较稳健的,本研究结论较为可靠。

## 3. 区域异质性分析

为进一步考察文化距离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跨国流动的影响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依据联合国组织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界定标准,将样本分为以下两组: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亚、安哥拉、阿尔及利亚、俄罗斯、秘鲁、阿根廷、委内

瑞拉9个发展中国家样本,日本、新加坡、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10个发达国家样本。以下结果显示,在发展中国家样本与发达国家样本中,文化距离的 $P$ 值分别为0.385、0.022,表明文化距离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入发达国家的负向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同时,由两个文化距离系数可知,文化距离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跨国流动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具体而言,文化距离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入发达国家的阻碍效应明显强于发展中国家,证实了 $H_2$ 。

表4 区域异质性回归结果

Variable	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
CD	-0.285 (0.310)	-1.204** (0.434)
Observations	153	170
R-squared	0.206	0.461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误差;\*\*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

## 五、结论及启示建议

通过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各国的文化距离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跨国流动具有较显著负向影响,文化距离越大,文化差异越显著,中国农村劳动力则很难适应他国的思维方式、价值观、风俗习惯、行为礼仪等,不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中国与流入国的文化距离每减少1个单位,流入该国的中国农村劳动力人员数可能会增加68.8个百分点。此外,文化距离对农村劳动力跨国流动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即文化距离对农村劳动力流入发达国家的阻碍效应明显强于流入发展中国家的阻碍效应。

上述研究结论为新时期中国农村劳动力跨国流动的发展提供了启示:面对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劳务市场,弱化国家间文化差异的阻碍作用,是推动中国农村劳动力跨国流动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加快文化国际传播进程。“一带一路”建设为文化国际推广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赋予了中国文化传播新的强动力以及新的内涵与使命。中国应完善孔子学院的组织、管理、教学体系,充分发挥孔子学院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中的核心平台地位,同时致力构建国际文化传播新平台,创新文化传播途径,加大典籍译作、影视剧、歌舞等富含中国文化特色以及价值观的文化产品输出,为各国人民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提供更多的便利,降低文化距离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融入流入国经济活动带

来的消极影响。较之发展中国家,中国文化传播的力度在发达国家应该要更大、传播渠道与形式应该要更加灵活多样,进而大幅度削弱文化距离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入发达国家的阻碍作用。

第二,提高文化融合度与包容度。文化传播需借助文化共同体建设以增强文化认同感,而文化共同体建设的基础是不同文化相互交融、同向发力。各国文化某些具体的文化形态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在关注人类文化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以及考虑本国文化未来发展方面也存在共同点,通过深入挖掘并利用这些文化共性,增强文化共鸣与文化共情,拉近国家间文化距离;在传播中华文化、寻找文化共性的同时,应求同存异,尊重其他国家文化的发展与壮大,重视文化的交流互鉴,致力于打通文化交流脉络,为中国农村劳动力跨国流动创造一个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的文化环境。

第三,加强流入国文化培训。中国应重视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入国文化教育培训,应将流入国文化培训纳入劳动力对外输出建设框架中来,制定一套系统的培训方案,并根据农村劳动力群体特征,采取合适且具有针对性的方式展开文化培训。培训过程中需加强他国人文地理、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生活礼仪等各方面知识的普及,增加农村劳动力对流入国文化的了解与认知。减少跨国流动中的文化障碍以提升农村劳动力在流入国的适应能力,以建设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为前提,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谋求中国农村劳动力跨国流动的新突破。

#### 参考文献:

- [1] YASAR KONDAKCI. Student mobility reviewed: Attraction and satisfac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urkey[J]. Higher education, 2011(11): 573-592.
- [2] MAZZAROL T, G N SOUTAR. Revisiting the global market for higher education [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2012(5): 717-737.
- [3] 魏浩, 赖德胜. 文化因素影响国际留学生跨国流动的实证研究——兼论中国扩大来华留学生教育规模的战略[J]. 教育研究, 2017, 38(7): 55-67.
- [4] 郭新茹, 彭秋玲, 刘子琰. 文化距离、文化贸易壁垒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效应分析[J]. 江苏社会科学, 2018(6): 106-116.
- [5] 许和连, 李爱萍. 文化差异、地理距离对我国各省分国别(地区)出口贸易的影响[J]. 湖南大学学报, 2015(7): 58-66.
- [6] 李月娥, 张吉国. 文化距离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研究——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证据[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9(9): 64-70.
- [7] 彭继增, 张思娟, 徐浩. 文化距离对中国进出口贸易效率的影响——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实证[J]. 统计与决策, 2020(9): 86-90.
- [8] 卢朋. 中国对外劳务合作的发展特征、挑战与政策应对[J]. 劳动经济研究, 2017(2): 112-126.
- [9] 王殿华. 东北地区劳动力国际流动的特点、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J]. 人文地理, 2005(6): 15-18.
- [10] 钱雪亚, 张小蒂. 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及其收益特征[J]. 中国农村经济, 2000(3): 25-31.
- [11] 陈昭玖, 谢秦华. 产业转型背景下中部地区农民工就业流动研究——以江西省为例[J]. 农业经济问题, 2014, 35(3): 56-61.
- [12] HOFSTEDE GEERT. Culture's Consequences: Comparing values, behaviors,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across nations(2nd ed.)[M].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1.
- [13] SCHWARTZ S H. Refining the theory of basic individual values[C]//Steve J, Kulich, Liping Weng. Value dimensions and their contextual dynamics across culture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4.
- [14] INGLEHART R, WELZEL C.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15] 田晖. 国家文化距离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影响的区域差异[J]. 经济地理, 2015(2): 22-29.
- [16] KOKKA A. Distance, transaction costs, and preferences in European trade[J].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2014, 28: 87-120.
- [17] BECKERMAN W. Distance and the pattern of inter European trade[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56, 38(1): 31-40.
- [18] 綦建红, 杨丽. 中国 OFDI 的区位决定因素——基于地理距离与文化距离的检验[J]. 经济地理, 2012, 32(12): 40-46.
- [19] TINBERGEN J. Shaping the world economy, appendix VI to an analysis of world trade flows[M].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62.
- [20] LINNEMAN H. An econometric stud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flows[M].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1966.
- [21] BERGSTRAND J. The generalized gravity equation,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the factor-proportions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trade[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89, 71: 143-153.

责任编辑: 曾凡盛